

# 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宁波

顾玮 吴央央 整理

## 新式教育应运而生

宁波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一。1842年，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，并于1844年正式开埠。宁波站在了大变局时代的风口浪尖上，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荡下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与风俗、思想意识和心理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。

美魏茶，英国传教士，曾在宁波生活了7个月。回国后，撰写了《在华生活》一书，书中有一幅宁波地图。在书的前言部分，他明确表示，希望自己绘制的地图和关于旅行的见闻，能够成为对西方旅行者和探险家有价值的旅行指南，所以，这幅地图是最早的宁波“旅游手绘攻略图”。地图上标识了一些当时宁波的著名地点，如天封塔、鼓楼、天一阁等，当然，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学校——宁波女学。

这所学校由英国女传教士奥尔德赛一人之力于1844年创办，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称号——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。众所周知，旧中国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女性被束缚在家中，从来没有学校教育这一说，而宁波女学的开办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。

宁波女学在1857年和崇德女校合并，位于现在姚江北岸的槐树路。1923年，该校的中学部又与圣模女学的中学部合并，新校定名为“私立甬江女子中学”，这所学校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初中母校。甬江女中的旧址在今天的和义路，现为宁波教育博物馆。

在当时的宁波，采用新式教育的学校还有崇信义塾，是近代浙江省最早的男子洋学堂。该校于1868年迁到杭州，改名育英义塾，是后来之江大学的前身，也

可谓浙江大学的最早源头。到民国时，国人兴起办学热潮。

因为宁波早期的西式学校多由外国传教士所办，这些洋教士也就成了宁波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外教，现举两人为例：

一是麦嘉缔，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，医学博士。1844年到达宁波后，长期在崇信义塾担任教师。宁波四中的前身之一崇信中学，也是由他募集资金于1881年创立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麦嘉缔夫妇在宁波期间收养了本地的一个孤儿，名叫金雅妹（又名金韵梅），麦嘉缔夫妇去日本时携其同住，之后又带她到美国读书。这个女孩最后从医科大学毕业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”。

二是丁甦良，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，曾长期在宁波办学，后担任清朝同文馆总教习以及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。北大



吴央央 摄

一直将京师大学堂视为建校的开端，因此，有人甚至认为丁甦良是北大的首任校长。丁甦良在中国的教育之路就是从宁波开始的。这些西式学校的教学课程中外兼容，既有中国儒家的童蒙读物和四书，但更多的还是近代的科学知识，比如算术、几何、物理、地理、天文等科目，甚至还有音乐和体育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些西学的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，办学就只能自己编写。可

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本是为宁波孩童编写的教科书，最后竟然成了近代东亚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形势、学习西方新知识的启蒙读物。如《地球图说》本是为学生们编写的一本简明世界地理读物，后被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看到了，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中，竟然征引了该书30段内容。这本教材的扩充本《地球图说》后来传到日本，影响更大。

**主讲人名片**  
田力 历史学博士，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西关系史、浙江地方史。近年来主持省部级、市厅级、校级课题8项，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。

**好声音**  
——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些西学的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，办学就只能自己编写。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本是为宁波孩童编写的教科书，最后竟然成了近代东亚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形势、学习西方新知识的启蒙读物。  
——开埠，给宁波带来的不仅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，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知识体系、社会观念、道德规范、价值取向、行为方式等带来了剧烈冲击。面对这样的冲击，宁波人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变。

**主讲人名片**  
戴松岳 江北慈城人。教过6年历史，修过8年县志，编过12年报纸，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史研究，对宁波地方文化深有造诣。著有《怅望千秋家国梦》《风流千古说慈城》《儒魂商魂：慈城的名人与望族研究》（合著）《清初甬上诗社和诗人研究》等。主编和负责编辑了《鄞州人文读本》《慈城—中国古县城标本》《蒙学之冠》等20余部文史书籍。

**好声音**  
——鄞州文化，也就是鄞县文化，可以说是中国县域文化的一个典型。它的典型性在于既以中华文化为主体，又广泛地吸纳了日本、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外来文化。  
——心学流派，注重于世界的变化，注重于思维的交锋，注重于人生的变革。因此，历史上鄞人富有冒险精神，富有向外开拓、向外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## 其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

1854年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创办《中外新报》，这是浙江省最早的近代报纸，不仅能够及时地报道地方重要事件、国内大事，甚至还有世界新闻，非常难得。

在此之后，《甬报》《德商甬报》《四明日报》等相继诞生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宁波本地的报纸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，良莠并存。近代新闻出版事业在宁波的勃兴，起到了开启民智、传播知识的重要作用。

作为新鲜事物的西式医院也在此时兴起。之前提到《中外新报》的创办者玛高温，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近代宁波最早的西式医院创建人。1843年，他在宁波城内开了一家西医院，几经沿革，民国初年，发展为“华美医院”，后又改名为宁波第二医院。

除了这所医院外，甬城内外又相继出现了10余家西式医疗结构，既有洋人创立的，也有中国人自己办的。西医带来了治疗病痛的全新技术，提高了宁波人的

健康水平，也加快了近代宁波人接纳和认同西方文化的进程。

宁波开埠后，江北岸地区被辟为外国人居留地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成为五洋杂处的繁华场域，许多新鲜事物首先出现在这里，如领事馆、海关、银行、洋行、邮政局、电灯、马路、轮船等。

英、美、法、葡四国领事馆，最初的位置集中在姚江北岸，但后来相继搬走或关闭，只有英国领事馆建筑留存至今。

宁波开埠之后，在原来江东常关的基础上，又于1861年在江北岸设立浙海新关。浙海关是我国最早的初具现代海关职能的机构之一，是中国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。它的旧址被保存下来，200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许多著名的洋行，如旗昌、太古、三井、怡和等在江北岸外滩设有分支机构。到1890年，在宁波的外国公司和洋行竟达28家之多。宁波的“洋货”进口也持续增长，包括洋布、洋烟、洋

皂、洋药、洋油、洋火、洋钉、洋铁等，近代工业品开始逐步取代传统商品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。

1878年，宁波海关书信馆开始收投公众信件，并附发大龙邮票。1883年，一种更快捷的通讯形式——电报进入宁波，在宁波城内建立宁波电报分局，并配备莫尔斯收发报机。1885年，在中法战争前夕，又架设了从新江桥堍到镇海的专用电报线路。镇海战役中，电报通讯确保了军讯及时准确的传达，为战役胜利打下基础。战后，宁波的有线电报很快向民用开放。

宁波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木帆船港之一，而在近代，它最早向轮船港转变，其重要标志就是拥有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轮船——宝顺轮。在庆安会馆，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清末文人董沛撰写的《宝顺轮始末》石碑，篇首句即写“中国之用轮船自宁波宝顺始也”。

宁波的商业船帮分成南北号，从1853年开始，北号商人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为清廷

从海路运送漕粮。而当时江浙沿海海盗众多，在此情形下，1854年冬，宁波北号商人耗资7万银圆购买宝顺轮用于护航。宝顺轮的出现，意味着宁波港作为单纯帆船时代的终结，同时也宣示着中国蒸汽轮船时代的到来。

其他新鲜事物还有不少：在江北岸设立的巡捕房，是近代宁波警察局的雏形；19世纪80年代，江北岸设路委员会，后改组成为工程局，负责道路、卫生、电气、水道等事宜，是近代市政建设之始；宁波的近代工业也开始起步，通久源轧花厂、永源丝厂、通利源榨油厂、慈溪火柴厂、宁波电灯厂、和丰纱厂、大茂肥皂公司等近代企业相继创办。此外，照相馆、眼镜店、钟表店、大药房、戏院、番菜馆、弹子房等新事物，不断丰富着宁波人的生活。

开埠，给宁波带来的不仅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，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知识体系、社会观念、道德规范、价值取向、行为方式等带来了剧烈冲击。面对这样的冲击，宁波人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变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）



“华花圣经书房”铅字排印本《地球图说》（田力供图）

浙江的近代新闻出版事业始于宁波。1845年建立的“华花圣经书房”是江浙地区第一个近代印刷机构，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介绍近代知识的书籍，使得当时的宁波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传播基地之一，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。

# 鄞县文化是中国县域文化的典型

陈青 整理

徽州文化是中国最著名、最典型的地域文化，但它的范围是一个府，也就是地区。那么，能够代表中国一个县区的文化，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，那就是鄞县，也就是现在的鄞州。

想到徽州，我们会想到徽商、徽派艺术、徽派建筑、新安画派、新安艺术。而想到鄞州，会想到红帮裁缝、水利文化、耕作制度等，它们在全国有特殊影响。所以鄞州文化，也就是鄞县文化，可以说是中国县域文化的一个典型。它的典型性在于既以中华文化为主体，又广泛地吸纳了日本、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外来文化。

鄞县文化有什么特点？归纳起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注重内心体验，注重变化，充满创造力。中国有一句古语叫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。“山”代表了凝固、坚硬，“水”代表着变化和流动。鄞地既有大湖、大江，更有连接太平洋的东海以及重重四明山。环境的特殊性，让鄞地充满了富有变化和创造的人文基因。

“心学”有三大大家，其中创始人是南宋的陆九渊，当时陆九渊最著名的四个学生杨简、袁燮、舒璘、沈焕，先后在鄞县活动。心学流派注重于世界的变化，注重于思维的交锋，注重于人生的变革。因此，历史上鄞人富有冒险精神，富有向外开拓、向外发

展的内生动力。

第二，鄞地有重视教育、注重知识传承的人文传统。鄞人重视教育，重视学习，重视读书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，是一种生活状态。我举三个例子：

宋代的藏书家郑若冲喜爱读书，经常废寝忘食，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读书？他说，如果我一天不看书，照镜子就会觉得自己面目可憎。

屠隆的侄孙屠本峻是个文学家，《金瓶梅》的后记就是他写的。他的房间里，床上、书桌上到处是书，一直到80多岁还每天坚持读书。他说，书，饥的时候可以充食，渴的时候可以当茶，烦躁的时候如音乐可以使人静下心来，睡觉的时候可以当枕头。读书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。

更感人的是西乡的杨文瓚，杨文瓚积极参与了钱肃乐、张苍水的反清斗争。他被清廷抓住后定了秋后斩，关在杭州监狱里。父亲杨太公想办法给他带去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只有一句话，“汝一日不死当一日读书”。杨文瓚看到老父亲的勉励，非常感动，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感人至深，“做鬼直须闻道后，断头方是息肩时”。这些故事是鄞人千百年来崇尚教育的缩影。

中国教育史上有三个里程碑的著作，也与鄞县有关。

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这句话出自《神童诗》。这

是谁写的？是鄞县人汪洙，他的这一首《神童诗》揭开了鄞县教育的伟大篇章。

而后，王应麟又写了《三字经》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简明的百科全书。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《世界儿童道德教材》，这意味着《三字经》从中国的国学经典，变成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。

元朝时，程端礼和程端学两兄弟办了一所学校，就在现在张斌桥附近。他们设置了一个《程氏读书日程》，明确了每年读什么书，每个月怎么读书，每天怎么读书。这一个读书计划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各阶段的读书课程表，后来被国子监看到了，就成了全国通行的教学日程。

第三，鄞人有求新、求美、求变、求同的文化艺术追求。鄞地一边有巍峨的群山作为根基，一边面临滔滔的大海启迪人们的想象，因此，这里的人们对文学艺术有着天然的审美取向。

宋以后，鄞地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和词人，丞相史浩就是一个著名诗人，更出名的是吴文英，他一生留下的词有340多首，很多句子脍炙人口，如“何处合成愁，离人心上秋”，用合字的方法把一种抽象的感受具化为一个具象的字。他还写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首词《莺啼序》，240个字，词律也是他创制的。

张可久就更了不得了。我们



谢斌 摄

讲元曲会想到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白朴、郑光祖，他们被称为“元曲四大家”，但是，元曲四大家的代表作品是杂剧，而能够延续唐诗宋词题材和韵律的韵文作品应该是元散曲。留存至今的元散曲只有4000多首，而张可久一个人留下的曲就有846首（套），占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多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鄞地也有很多画家，如明朝的陈沂、清代的陈撰、当代的沙耆等，他们的画风追求与时俱进。鄞人求新、求美、求变、求同的文化艺术理念，在电影发展方面显得更加突出。《马路天使》《毕业歌》的导演是鄞县人袁牧之，上海滩最大的电影公司和剧场的老板是鄞县的柳中亮、柳中浩两兄弟，周璇被他们培养成一代歌后，以后的王丹凤也是鄞县人。

第四，鄞地有四民同道、农

商并重的社会氛围。鄞人既重视读书，骨子里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，也不鄙视工业、商业。东钱湖有个陶公山，相传与号称“陶朱公”的范蠡隐居于此有关，说明鄞州的商贸传统由来已久。宋时，宁波是中国的对外三大口岸之一。到了明清，商贸继续发展。鸦片战争后，一大批宁波人前往新兴的工商城市上海，在上海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。宁波帮里，虽然领袖人物很多是镇海人、慈溪人，但是占人数最多的是鄞县人。

四民同道、农商并举，推动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，既奉献了人才和财富，又使各种行业平衡发展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鄞县迅速崛起，成为全省财政收入最多的一个县（市）区，并且延续至今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2016年11月鄞州区图书馆明州大讲堂，有删节）